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Xue Xianzhou, 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and Student Societie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薛仙舟、平民学社与五四时期学生社团的关系网络

刘璐 Liu Lu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0

内容提要:

1920年代前期, 私立复旦大学商科学生试图寻求社会改造, 创建起传播合作主义的学生组织——平民学社。时任复旦教务长的薛仙舟是五四时期中国较早关注合作主义思潮的关键人物, 在以薛仙舟为主导, 邵力子、戴季陶、汤松等复旦教职员组建起的师生关系网络的影响下, 平民学社得以解决学生社团初创时期的经费、印刷及思想等困境, 推动合作主义在地方的落地、与国际的联合及上海地区合作联合的开展等, 初步构建起传播合作主义、推动合作运动的区域网络。1924年之后因邵力子、张廷灏等的人际关系, 邓中夏、唐际盛等革命知识青年参与撰稿, 这促使平民学社内部对合作主义的走向产生分歧, 多数成员参与国民革命。但是成员始终坚持其“合作共和国”的理想社会, 将加入国民革命视为实现合作理想社会的手段, 而非最终目的。薛仙舟与平民学社的社交网络在国民政府时期合作运动发展过程中仍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薛仙舟 平民学社 复旦商科 合作主义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20s, business students at the Fudan University tried to seek social reform and set up a student organization—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to spread cooperativism. Xue Xianzhou, then dean of Fudan University, was a key figure who paid early attention to the trend of cooperativism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established by Shao Lizi, Dai Jitao, Tang Song and other teacher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led by Xue Xianzhou, 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was able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funding, printing and thinking in the start-up period, promote the landing of cooperativism in the local area,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regional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and initially build a regional network for spreading cooperativism and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movement. After 1924, due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Shao Lizi and Zhang Tinghao, Deng Zhongxia, Tang Jisheng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participated in writing, which prompted disagreements on the trend of cooperativism within 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and most members w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However, the members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ir ideal society of “cooperative republic” and regard join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as a means to realize their ideal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Xue Xianzhou’s social network with 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still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Key Words: Xue Xianzhou; 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Business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 cooperativism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并设商科，是国内最早设立商科的大学。复旦商科改变传统办学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法，努力为学生提供实践练习的机会，致力于培养近代工商业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正是在这一学科背景下，商科师生对合作主义这一经济改造思想关注密切，复旦教务长薛仙舟提出合作运动是不谈社会主义即可实现社会革命的道路，学生倪鸿文同样表达“做到合作运动，一方面是经济改造，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到那时，资本主义，不推倒而自敛迹，同样，不谈社会主义而社会革命已奏凯旋”^[1]。以合作主义为核心，商科师生先后成立上海合作储蓄银行、平民学社、上海合作同志社等合作组织。尤其是平民学社，成为传播合作主义和推动合作运动开展的“先锋社”，乃至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主要成员逐渐成长为主导国民政府合作运动的重要角色。

关于平民学社，既有研究多以国共两党“运动学生”为中心展开叙事，注重讨论复旦整体校园氛围及薛仙舟等教职员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形成平民学社最终走向国民革命的线性解释^[2]。近年来学界对上海学运的研究尝试深度挖掘学生社团的人事构成及机构组织^[3]，并且有学者注意到“组织”的力量对于青年学生生活世界等的重要性^[4]。事实上，平民学社依靠组织运作，试图构建其合作主义的理想社会。本文试图聚焦复旦师生与社会各界之间的网络与互动，重视作为背景、舞台的上海及复旦商科对于平民学社的影响，考察薛仙舟与平民学社如何凭借师生社会关系网络将合作主义运动迅速扩展至各个地区，及揭示知识青年在思想冲突下如何做出不同抉择。

一 “师生互为表里”：薛仙舟与平民周刊社的创立

五四之前，关注合作主义思想的有许多复旦的教职员，其中不得不注意到教务长薛仙舟的网络关系。薛仙舟（图一），原名颂瀛，1878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县，16岁考入北洋大学，于1900年同王宠惠等八人由盛宣怀、唐绍仪等公费咨送至美留学^[5]。薛仙舟在美攻读经济，曾积极组织留美学生，以响应国内李登辉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抵制美货、抵抗美国虐待华工的活动。而后与王宠惠等人请求转学^[6]，1908年转赴德国攻读银行经济，接触雷发巽式与许尔志式合作银行，“笃信由此理论而产生之经济合作制度”，甚至可以说是“极度迷信”^[7]。在德期间薛仙舟与孙中山同为旅欧学生，并参与同盟会，二人成为挚友。

中华民国成立后，复旦公学复校，李登辉任校长，孙中山、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为校董会成员，教职员当中戴季陶讲授经济学、邵力子讲授国文等，复旦被认为是

生先舟仙薛長務教



图一 中国合作导师薛仙舟导师（引自《复旦年刊》1920年第2期）

国民党在上海地区革命宣传的重要地点^[8]。薛仙舟在留学及回国初期与唐绍仪、孙中山、王宠惠、李登辉等人相交甚笃，因而1914年受李登辉邀请在复旦任教，教授德文、公民与经济课程，陈果夫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9]。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并创设商科，李登辉继续长校复旦，薛仙舟担任教务长。李登辉办学方针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为“学生自治”，这一方针促使复旦学生在校内最大限度享受自由、宽松的环境，“复旦学生，信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所共知也。”^[10]同时复旦一直注重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培养，学校通过国庆及国耻纪念会等活动方式，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11]。在此氛围下，商科学生自身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毛飞曾概括总结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特征，认为其团体分为两类“（一）注重‘自我’的修养（二）注重‘社会’的贡献”^[12]。这一特征在商科学生社团中体现同样突出，商科学生在1917—1920年间创办膳食委员会等“注重‘自我’的修养”的自治社团，也组建复旦商店、商业研究会、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等组织进行社会服务与贡献，这些组织“皆为复旦学生服务精神之具体的表现”^[13]。其中卞燕侯、鲍思信、戚其章、徐树声、陆思安等学生同时参与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商业研究会等两个及以上的社团组织中，活跃度极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因政治觉醒较早，五四爆发之后，卞燕侯等复旦学生在李登辉、邵力子等赞助与指导之下，迅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参与到五四学潮之中^[14]。学潮的失败促使学生对政治与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与谴责，与此同时希望未来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是平等、民主的社会，因而不断地寻求途径以实现“社会改造”“社会革命”^[15]。参与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朱承洵、杨道腴、黄华表、李安、余愉、卞燕侯等学生受“社会改造”的号召，认为五四运动之后国势仍然危急，开始酝酿创建一个揭露平民悲惨困境、寻求改造社会途径的组织。

1920年5月1日，由李荣祥、黄华表、毛飞、谭常恺等发起，平民周刊社正式创立。平民周刊社起初并非宣传合作主义的社团，而是期望通过组建组织、发行报刊、宣传平民主义的方式尝试整体的“社会改造”^[16]，对外征稿时也主张“凡对于一切问题有所批评，于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17]。但很快发现仅以给平民灌输一些知识为目的的宣传效果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老百姓没有闲暇时间读《平民》，甚至“不要钱送他一张，他不独不要，还要冷颜铁面地望着你，好像是扰乱他们的清兴一样”^[18]。平民周刊社初期宣传并无实际成效，但作为一个学生组织，社团危机难免需要依靠学缘关系来寻求解决途径，这必须要讨论薛仙舟及其对合作主义的关注与实践。

薛仙舟一直向学生教授合作主义学说，多次在复旦、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开展相关演讲^[19]。1919年在复旦创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尝试组建信用合作，并为商科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其他教职员也深度参与其中，李登辉为合作银行监事会会长，监理有薛仙舟、邵力子等，开幕时邵力子、戴季陶等均进行演说致辞^[20]。此外，薛仙舟常与戴季陶讨论合作主义，“并筹划普及民间之法”，至1920年，邀请戴季陶“在复旦大学作合作理论政策之经济学讲演约七八次”^[21]，其演讲稿整合后在《建设（上海1919）》中发表，并努力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22]。汤松、林天木等教职员也是合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至此，复旦形成由薛仙舟为主导，其他教职员密切关注并努力推动合作事业发展的氛围。

起初平民周刊社中复旦商科学生占九成以上，成员凭借学科背景及校园氛围多注意到社

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因而注意到合作主义这一经济思想。王世颖在第四号中发表一篇专论消费合作的文章《消费合作与劳动问题》，这是《平民》上第一次谈合作主义的论文。与此同时毛飞向戴季陶询问其对于《平民》的批评，戴季陶指出“平民内有合作文章，最好是以后专提倡合作主义”，“要知道五四以后出版物很多，若不专谈合作主义，恐怕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且谈到薛仙舟研究合作多年，可以多多与他联系^[23]。在与薛仙舟多次沟通后，薛仙舟不赞成社员之前空洞的宣传方式，表示“改造社会，不是空空洞洞的群众运动可以做到的；要从实力着手，才是建设的硬功夫。望你们发行周刊，一方面宣传，一方面实行。做不到的不要瞎讲”^[24]，这成为成员们决心鼓吹推行合作主义的催化剂。于是《平民》从第五号开始主张“打破资本垄断，抱合作主义，实行经济解放，有互助精神，发达义务教育，享平等幸福”，并由薛仙舟接办^[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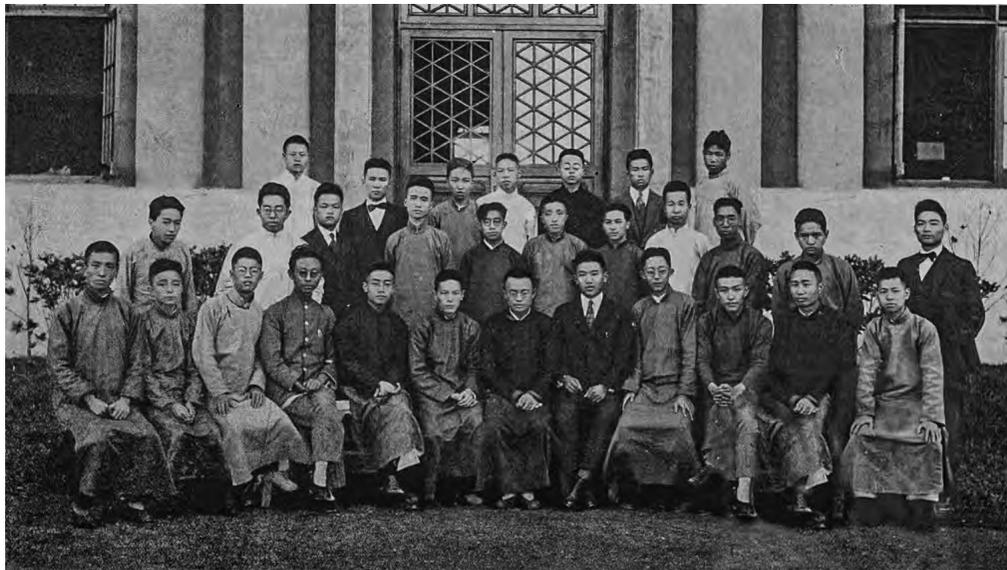
在经费问题上，创立起初报刊款项主要依赖社员筹集，经费来源不稳定，并且前十期由《救国日报》刊行，报刊完全免费送看，“如果卖钱，一定不能使《平民》推广到平民窟里去”^[26]。但这种方式无法支撑社团长久发展，李安与毛飞便前往民国日报馆与邵力子商议。邵力子允许其在民国日报馆代印，作为《民国日报》副刊印刷，这使得经费上的负担减少了三分之二^[27]。此外，社员们与李登辉商量经费困难一事，加上汤松、邵力子等热心赞助，在教职员会议中完全通过，“最终由教职员按月薪百分之五资助，总共月得银币一百十四元”，以作印刷费用，不久又改为自由捐，不足的由学校津贴补充^[28]。但随着《平民》影响日益扩大，外界人士索阅者越来越多，“每期赠阅将及四五千份，原有的经济力，深恐不能支持久远”，于是平民周刊社决定于1921年7月开社内全体会议，最终决议“自六十一号起，每张酌量收回纸墨等费一分”^[29]，以此解决经费困难问题。

平民周刊社在解决社团危机，决心宣传合作主义后，十分重视对国外合作材料的挖掘与翻译工作，通过教职工及留学同学等途径获取合作材料。薛仙舟与汤松等多次赴海外考察，带回大量合作书籍与报告，使学社了解各国合作事业发展状况^[30]。出国留学的同学也以多种方式调查合作事业或从事实践，如黄华表、卞燕侯等在美求学，组织“合作调查会”“实业益友会”等组织进行合作事业的调查与实践，为学社提供合作材料与国际信息，“看他们信中寄来的照片，已购就百余种书籍，大约来春可以到沪”^[31]。成员将收集来的合作材料进行翻译，“为不谙英文而爱读合作书籍者，辟一捷径”，希望通过文字宣传，可以“使国人闻风而起，明白合作主义实为改造现社会属灵丹妙药”^[32]。在改组前译著的33篇文章中，受材料来源的影响，英美等国的合作著作与调查的翻译文章居多，平民学社特开“合作研究”一栏，每期登载合作相关文章，做长期有系统地介绍。

“师生互为表里，所生影响尤巨”这句话虽是讲述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过程中复旦学生与教职员之间的关系，但不可不说，这一关系也影响到复旦其他学生组织，在平民周刊社中尤为突出^[33]。平民周刊社是在复旦的自治环境与政治教育背景下，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成立起来的。而其组织发展过程中，常常请教于复旦教职员，教职员亦尽力指导解决，共同努力宣传合作主义，成为20世纪20年代“合作主义先锋社”。

二 合作组织网络的构建及其影响

平民周刊社介绍合作主义一年多，“《平民》自己有一件最喜欢的事，就是觉得提携保护



图二 《平民学社》(引自《复旦年刊》1923年第5期)

彼的人们有增无减”^[34]，各地合作社与成员之间的来往通信越来越多，对《平民》周刊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使其审视自身情况，《平民》出版近两年的时间，但仍觉社会上大多数人麻木不仁，且“于实行方面，并没有去做”，因而成员决心将平民周刊社扩充改组。1921年12月6日经余愉、王世颖、侯厚培等提议，扩充改组为平民学社(图二)，英文名定名为The Ping M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平民教育、发展平民经济为宗旨”^[35]。

平民学社扩充后尝试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分设图书部、出版部和合作购买部三部，致力于扩大宣传途径，从事合作研究和实践。图书部主要是由社员出资购买合作相关书籍及杂志，以供社员研究和参考，常委托谭常恺等留学海外同学购买书籍^[36]。出版部分为编辑、经理二科，编辑科又分周刊、丛书二系。平民学社仍努力以更理解与接受的话语实现合作主义再宣传，将“舶来品”合作主义变为易懂明晰的合作主义，计划将译著以小册子的方式集结出版，“定名‘合作’，为平民学社丛书之一”^[37]。合作购买部以“谋社员共同利益”为宗旨，完全采用消费合作原理，“给一般热心创办合作社的人作一个摹本”^[38]。

在薛仙舟与平民学社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成为1920年代全国合作社数量最多的地区，薛仙舟在组建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与平民学社之后，不断拓展合作组织范畴^[39]。1920年12月，由薛仙舟、陈果夫等讨论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以研究合作学理，调查实施方案为主旨，主要成员与合作储蓄银行、平民学社高度重合^[40]。至此薛仙舟以复旦为中心，在上海地区形成银行金融、宣传、调查实践三管齐下的合作组织网络。平民学社早期凭借与民国日报馆及邵力子、戴季陶等社交网络，时常在《觉悟》《建设(上海1919)》上发表相关文章以扩大宣传途径，逐渐向《东方杂志》《民心周报》《银行周报》《解放画报》等其他报刊投稿。

除薛仙舟及复旦商科师生以外，上海还有其他较早关注合作主义的团体。1920年，商务印书馆便多次发表合作相关文章，其编辑杨端六等也多次进行合作相关演讲。有学者曾提出早期推广合作主义的刊物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反而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类一般知识性的刊物，而不是《平民周刊》^[41]。《东方杂志》为合作宣传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否认，但仍无法忽视平民学社的努力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业务科副科长寿毅

是平民学社寿勉成兄长，薛仙舟曾邀请他至复旦讲授“信托业务”。此外《东方杂志》中早期宣传合作主义的文章中多篇为平民学社汤松、孙锡麒等投稿，出版孙锡麒著作的《合作制度》《合作主义》等书籍^[42]。1922年商务印书馆柳溥庆、糜文溶等也“为了响应上海复旦大学提倡合作主义的倡议”，联合报馆内印刷工人成立同孚消费合作社^[43]。

与此同时，1922年上海商科大学师生王效文、郑重民、沙仲渊、刘梅庵等组织成立上海职工俱乐部，并在《时事新报》中发行《合作》副刊。其成立时认为合作主义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替代品的可能性，却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王世颖批评其不敢直白鼓吹合作主义，甚至试图迎合资本主义。两个组织之间的争论显示出平民学社在鼓吹合作主义过程中逐渐产生单一性，不容忍其他组织倡导的合作主义不纯^[44]。沙仲渊等批评平民学社在以往宣传过程中过多依靠文字，极少组织演讲等活动，这使得合作宣传始终无法达到理想效果^[45]。加之在改组后平民学社忧心“冒牌合作”的出现，“主义”思想产生了单一性等特征。因而在双重影响下，1922年10月王世颖在《平民》上的提出“关于组建合作研究社”的提议，这一提议引起了众多合作主义者的关注和讨论^[46]。最终，平民学社派张廷灏、侯厚培等为代表前往上海职工俱乐部和同孚消费合作社接洽。12月31日，由平民学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上海职工俱乐部、上海职工合作商店和同孚消费合作社等五个团体在中华职业学校职工教育馆举行成立大会，联合组成上海合作联合会^[47]（见表一）。

上海合作联合会以“谋相互的扶助，为普遍的宣传，养成合作人才，调查合作事业”为宗旨，凡在上海及上海附近的合作团体，无论是生产、消费、信用或宣传合作主义的团体，只要不悖于合作，经过合作联合会的认可，都可以成为其会员^[48]。1923年1月15日，上海合作联合会召开第一次总务会议，会议中推举王效文为临时主席，推举王世颖担任总务书记，并决议：成立合作星期学校，推举郑重民为主任；定期合作演讲，推举同孚合作社担任；筹备联合会合作季刊，推举王效文主任此事^[49]。星期学校以“灌输合作智识及日常应用学问，以期储备合作人材”为宗旨^[50]。星期学校的演讲稿在《平民》中刊登，但仅举办一期活动，便因成员四散而无法继续组织。

表一 与平民学社通信来往的各类合作社信息表

地区	社别	社名	成员与社员身份	成立时间
上海	信用合作社	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学生、工人、市民	1919年10月
	合作研究社	上海合作同志社	上海知识分子	1920年12月
		上海职工俱乐部	上海知识分子	1922年5月
	消费合作社	上海职工合作商店	学生、工人、市民	1922年6月
		同孚消费合作社	商务印书馆工人	1922年10月
联合会	上海合作联合会	上海知识分子	1922年11月	
长沙	合作研究社	湖南合作期成社	长沙知识分子	1920年12月
	生产合作社	湖南大同合作社	长沙知识分子	1920年12月
		长沙笔业工人合作社	长沙工人	1922年12月
汕头	消费合作社	汕头米业消费合作社	汕头铁路工人	1922年4月
成都	合作研究社	成都普益协社	成都知识分子	1922年6月
安源	消费合作社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安源路矿工人	1922年7月
武汉	消费合作社	武昌时中合作书社	旅汉知识分子	1923年1月
宁波	消费合作社	宁波第一消费合作社	工商界人士	1923年3月

资料来源：伍玉璋：《中国合作运动小史》，第33-53页；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年，第78-82页。

平民学社在上海地区初步形成合作组织网络的同时，其影响也逐渐向地方拓展。为了扩大合作主义的宣传，并让热心人士将《平民》视作合作先锋，大量刊登读者来信便成为最直接的方式。平民学社在报刊中开设“合作消息”一栏刊登信件（后改为“通信”），其中来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早期平民学社成员常凭借关系网络向外寄送合作银行章程、《平民》报刊等，以期扩大流传途径和供地方参考或研究，任培厚、廖仲铨等热心人士曾回信表示将在山西、天津等地试图联络同志或老乡，尝试创办合作社^[51]；二是许多读者在阅读数期《平民》后产生“合作社如何与资本家竞争”“合作主义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什么”等诸多问题，来信与编辑进行讨论研究^[52]；三是表一中多地合作社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如章程不清晰、消费合作社初创时商品如何定价等问题，求助于编辑，希望获得解决方案^[53]。前两种类型的来信更偏重于理论层面上的编读讨论，在讨论与互动过程中，编者的观点和主张对读者产生极大的影响。随着地方上合作社数量的不断增加，第三种类型的来信也逐渐增多，平民学社尽力援助地方合作社的创建与发展，推动合作主义在地方上“落地”。

总体而言，地方上合作社发展始终较为分散，但是湖南地区发展势头较好，这也与复旦商科师生关系密切。复旦教职员汤松在湖南商科专门学校任职期间，组织侯厚培、谭天愚等学生在组建湖南合作期成社。而后侯厚培考取复旦大学商学院，并成为平民学社骨干成员，加之毛飞、陈仲明等均为湖南人，多次在《平民》中发表湖南相关文章^[54]。1921年4月毛飞曾专程参观湖南大同合作社，并且邀请合作热心人士张农、李木等和生产技术人员张树声、李少陵等几位朋友一同参观，为大同合作社带来生产与合作方面专业知识与人才^[55]。此后，平民学社将大同合作社的消息告知湖南第一师范工学会等湖南地区其他合作社，“合计长沙方面，以往的有‘大同’与‘期成社’，目前又新添了工学会。我们诚诚恳恳地祝你们是‘长沙合作三友’呀！”^[56]希望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形成地域合作组织网络。此外，因平民学社成员多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学生的流动性很强，每年都会有毕业的同学出国留学，或步入社会谋事。虽然常有“风流云散”之感，但是学生多在当地鼓吹合作事业，“仍然不减旧日的爱情”，如温崇信在宝应、陆渭卿在杭州，“芝轩到港以来所以不能稍忘合作主义也”等^[57]。乡缘促使他们在地方上经常介绍合作知识、宣传合作主义，使实行事不致因流动性而停滞。

平民学社除在国内努力扩大宣传构建组织网络以外，还尝试与国际联系。1921年6月，美国合作学会（American Co-Operative Union）月刊刊载一则消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最近组织一个合作会社，该社名平民学社。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合作运动的第一声。”^[58]同时，国际合作联盟秘书长梅氏（H.J.May）致函平民学社，告知有关该联盟的消息，并且征求平民学社为会员^[59]。平民学社收到信函之后，连出三期《国际合作专号》，宣传介绍国际合作运动开展的现状，同时总结了国内合作运动发展状况材料向国际宣传，国际合作联盟会月刊十一月号刊布了《中国合作之发展》一文^[60]。除此之外，上海合作同志社理事程婉珍曾访问英国女子合作社总机关，将国内一切宣传与实践的活动告之该社，这使得平民学社发觉国内极少提倡女子参与合作运动^[61]。因缺乏妇女合作运动相关资料，张廷灏致函国际合作妇女委员会秘书长戴维斯（Davies）索取相关资料，并将中国合作运动的相关概况告之。而戴维斯已辞职，由继任者何诺拉（Honora Enfield）回复，何诺拉表示“尤其是高兴知道先生正想在合作运动中，把妇女组织起来”，并且送上了英美两国妇女合作团体资料。

平民学社接到回信后，得知国际妇女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在《平民》第173期起，连续刊行三期《妇女合作专号》，希望“能够引起我国女界对于合作运动亦能发生兴味，并且使中国合作界中从此多了一支开疆拓土的生力军”^[62]。但是成员们终未能调动妇女对合作主义的关注，20年代初期的合作事业中仍是缺少女性的声音。

三 革命知识青年介入与平民学社后期的思想抉择

五四后知识青年试图以社会改造的方式建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与无序混乱的政治现实两者之间的拉扯使得他们普遍厌弃政治，平民学社无出其右。加之多次与北京政府之间发生冲突，使得他们对政治极度不信任，因而创建初始不希望合作主义“沾染任何政治臭味”^[63]。随着其目光逐渐转向农村地区，平民学社响应“到民间去”的口号，在思想层面上对合作主义的认知也实现了非政治向政治的转化，逐渐认为国家的职能不可忽视，“非私人所能担任，亦非以团体中所能担任，非由国家去办不行”^[64]。同时合作主义与政治脱离不了干系，合作运动也并非是非政治运动，“曾记得合作同志社成立的记事中，说有合作和政治毫无干涉。我们也自知这是不对，很不满意”^[65]。平民学社在停刊两周之后，“深以合作运动未得帮助政治及离开农工太远为虑，亦即未办出美满成绩的所以然处。因此认定加入政治运动，亦为接近农工的要图”^[66]，将《平民》改名为《平民周报》，并且专开“调查”与“劳动消息”两栏，专以调查发布与劳工相关问题。以往研究将此作为平民学社后期走向政治激进的标志，简单描绘平民学社后期选择加入国民党并最终消散，却忽略了学生自身的思想发展历程、冲突与抉择。从学生角度出发，能够更清晰地描绘出平民学社做出这一选择的原由。

改组《平民周报》之后，文章主要撰稿人增加了邓中夏、张秋人、唐际盛、刘伯伦、陈为人、洪扬生等共产党员。这些革命知识青年的加入与邵力子、张廷灏（图三）关系密切。1922年于右任、邵力子等创建上海大学，并邀请邓中夏、瞿秋白等至上大工作，此外聘请蔡和森、沈雁冰、杨贤江、恽代英、张秋人等党团领导人兼课^[67]。此外，张秋人、刘伯伦等多人均在民国日报馆工作^[68]，邵力子、陈望道、张秋人、张廷灏等人常在中共在上海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中相见^[69]。因而张廷灏在民国日报馆、平民女校中常与党团领导人相见，于1922年由张秋人介绍加入共青团^[70]，1924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扩大改组为团江浙皖地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张廷灏任学生部主任^[71]。张秋人、张廷灏同为执委会委员，1924年与刘伯伦、张秋人等为国民党委员会委员^[72]，与邵力子、毛泽东、刘伯伦、邓中夏、张秋人、刘伯伦等多人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73]。1924年7月，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另推荐中共党员张廷灏继



图三 张廷灏肖像（引自《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半年刊》1927年7-12期）

任组织部秘书”^[74]。

平民学社成员与革命知识青年均赞成推动合作者以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革命的方式参与政治，但双方之间仍产生分歧。其分歧以是否应继续宣传合作原理为表象，社团成员始终坚持“不嫌重复”，以浅显的文字介绍合作原理，此外关注调查农工以扩大合作主义宣传效果及推动合作运动的开展^[75]。而另一方则认为无需再继续讨论合作主义，“而注意于调查国内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讨论关于工人农民的各项问题，研究增高工人农民地位解除他们痛苦的方法：简单点说，本刊誓为工人农民——社会的柱石——的咽喉”^[76]。

究其根本，分歧的产生是源于双方在现实危机感的驱使下，对新理想社会的构建及通向理想的途径有所不同。汤松在《东方杂志》中这样论述合作主义与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设合作之范围愈扩张，则国家之职务愈缩小。纵不必迟至于零点，亦可至极简单”，“故自长久时间观之，合作运动寓政治之根本改造于其中，而就暂时观之，则解决时局，另为一事，非合作运动所能越俎”^[77]。这一观点被平民学社成员普遍认可，并将理想社会构建为“合作民治 (Cooperative Democracy)” 社会或“合作共和国”，合作主义是以和平的经济改造方式走向未来社会的途径^[78]。张廷灏认为参与国民革命并非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合作理想社会的一种途径与手段，“我们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先来把现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般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军阀，一古脑儿推翻了！三民主义能够实现，我们理想中的合作共和国也就可以实现了！”^[79]与这一构想极不相同的是，1924年2月，陈独秀曾将合作社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免除阶级斗争的工具”^[80]。在这一引导下，唐继盛、刘伯伦等进一步阐述，认为以农民的能力尚不能引导他们作纯经济的斗争，因而要主张进行政治斗争，将合作主义与参加国民革命同作为工具，“到了国民革命成功以后，才有真正独立的劳动运动，那时工人有了团结奋斗胜利的可能，人有了鲜明的阶级斗争，才可以社会进化的原则，鼓吹工人要求的政权，要求管理生产”^[81]。邓中夏认为可先设法在农村推行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农民获得廉价物品和解除高利借贷的威胁，以此获得农民的信任，以利团结与组织农民进行政治斗争^[82]。

正因这无法调和的矛盾，平民学社成员终四处流散，王世颖、张廷灏等南下参与国民革命，余井塘、孙寒冰等人毕业后赴海外深造，其他成员毕业后也回至家乡。于是后期面临着稿源缺失、经济困难等问题，平民学社虽多次努力仍依靠学缘关系征求合作相关稿件，但难度极大，《平民周报》中合作相关文章占比越来越小。“惟工作范围虽扩大，而以经济支绌，且因人事也随学生毕业离校，引起甚大变动，致使工作进行困难益多。”^[83]以致平民学社在决心参与政治之后却快速衰退，伍玉璋在回忆平民学社的发展时所言“这期的平民学社，本是开中国合作运动的政治运动的先河，哪知他反而因此入了衰老期”^[84]。加之1924年江浙战争的爆发更是使得平民学社后期难以开展活动，“由江浙战事爆发后，（十月）中国国民党的党务，在恶势下不能公开活动，先锋社的工作亦因党务关系而随之宣告结束”^[85]。平民学社发展至后期困难重重，最终社团活动停滞。

四 结论

合作主义思想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已传入中国，而其广泛传播多得益于薛仙舟与平民学社。薛仙舟是中国早期接受并尝试将合作主义思想运用到改造社会中的先行者，在他的推

动下，平民学社接纳并鼓吹合作主义，邵力子、戴季陶、汤松等教职员积极帮助平民学社解决组织创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此外因薛仙舟等与上海名流政要之间的密切人际关系，复旦形成平民学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上海合作同志社三管齐下的合作组织网络。在上海最终构建起以薛仙舟与复旦商科为核心的宣传合作主义的师生谱系。

以师生谱系为基础，平民学社不断拓展组织活动范围。首先，平民学社不再将活动范围局限于复旦与民国日报馆，试图发挥上海舆论与出版发达的区位优势，与时事新报馆、商务印书馆等其他报馆成立的合作社共同组成上海合作联合会，以达到区域组织联合、扩大合作宣传途径的目的。其次，利用商科师生社交网络，平民学社开展各地合作事业调查，了解地方合作事业发展概况，指导帮扶地方合作社并尝试与国际联系。1924年，师生社交网络拓展至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地区，因而大量革命知识青年参与纂稿，并推动平民学社参与国民革命，却也因此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社团也迅速进入衰退期。

但商科师生仍期冀通过宣传合作主义等活动，最终实现合作理想社会。1924年7月，国共两党党员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合作运动协会，未产生太大影响^[86]。8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上海夏令讲习会，第五周以张廷灏、毛飞、许绍棣等讲解合作主义相关理论为主^[87]。1928年2月22日，陈果夫重新召集王世颖、寿勉成、张廷灏、许绍棣、余井塘等组织中国合作学社，它成为30年代中国最大的研究和宣传合作主义的团体。事实上，薛仙舟与平民学社所形成的师生谱系并非仅出现在1920年代复旦及上海地区，而是三四十年代遍布报刊书局、银行界、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与中央政治学校等各大高校合作系之中，努力推动国民政府时期合作运动的发展。因而薛仙舟被誉为“中国合作导师”，平民学社对于合作主义的宣传与实践也成为国民政府合作运动的思想来源，“由是在初期运动中，表现工作多些的是他，影响社会大些的是他，使中国合作在国际上闻名的仍是他”，被誉为“合作主义先锋社”^[88]。

注释：

- [1] 倪鸿文：《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村》，《平民》1921年第75期。
- [2] 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 [3] 陈以爱：《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开源书局，2021年，第11页。
- [4] 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知识分子论丛》2015年第1期。
- [5] 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5页。
- [6] 《王宪惠等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3-405页。
- [7] 余井塘：《我所认识的薛仙舟先生——书薛先生致陈果夫先生三函后》，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5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第2页。
- [8] 朱仲华、陈育德：《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29-149页。
- [9] 陈果夫：《纪念薛仙舟先生》，《江苏合作》1936年第6、7期。
- [10][13] 何葆仁：《复旦大学一九二五年年刊》，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 [11] 吴毓骧：《本校国庆纪念祝典纪事》，《复旦》1917年第3期；朱承洵：《记本校之国耻纪念会》，《复旦》1918年第6期。
- [12] 毛飞：《平民周刊记事》，《复旦年刊》1920年第2期。
- [14] 张廷灏：《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32页。
- [15] 李荣祥：《现代社会改造的研究》，《复旦》

- 1920年第9期。
- [16] 杨祚璋：《复旦〈平民〉周刊的责任》，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5页。
- [17] 《平民周刊社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22日，第2版。
- [18] 侯厚培：《本社两年来记略》，《平民》1922年第100期。
- [19] 《学术演讲会》，《申报》1919年7月19日，第1版。
- [20] 《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开幕记》，《申报》1919年10月24日，第10版；《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旨趣书》，《复旦》1920年第8期。
- [21]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专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40页。
- [22] 戴季陶：《协作制度的效用》，《建设（上海1919）》1920年第2卷第5期；戴季陶：《产业协作社草案理由书》，《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期。
- [23][27] 木公：《平民学社三年之回顾》，《合作专刊》（平民学社三年纪念册）1923年。
- [24] 同[16]，第18页。
- [25] 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 [26] 王世颖：《本社过去的历史》，《平民》1923年第152期。
- [28] 陆宝瓚：《本社一年间的回顾》，《平民》1921年第49期。
- [29] 《启事》，《平民》1921年第60期。
- [30] 《合作社的前途》，《平民》1920年第29期。
- [31] 毛飞：《海外校友会赞助合作社》，《平民》1920年第30期。
- [32] 《纽约龚强立君来函》，《平民》1921年第46期。
- [33] 章益：《追慕腾飞夫子》，钱益民著《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 [34] 《本社消息》，《平民》1921年第83期。
- [35] 《平民学社章程》，《平民》1921年第83期。
- [36] 张廷灏：《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9册 教科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5-107页。
- [37] 《平民学社消息》，《平民》1922年第94期。
- [38] 王世颖：《答刘启郊兄》，《平民》1922年第117期。
- [39] 《合作银行股东会记》，《申报》1920年12月2日，第10版。
- [40] 《合作同志社开成立会记》，《平民》1920年第31期。
- [41] 赖建诚：《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第45页。
- [42] 伍玉璋：《中国合作文献目录》，中国合作学社，1936年，第34页。
- [43] 《柳溥庆自述》，《柳溥庆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柳溥庆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第7页。
- [44] 解受伯：《答“平民”锡麒君》，《时事新报·合作副刊》1922年第2期；《给平民社的一封信》，《时事新报·合作副刊》1922年第3期。
- [45] 仲渊：《我对于合作联合的意见》，《时事新报·合作副刊》1922年第34期。
- [46] 王世颖：《组织合作研究社的提议》，《平民》1922年第123期。
- [47] 《合作联合会之筹备》，《申报》1922年11月3日，第17版；刘梅庵：《上海合作联合会成立纪念大会记》，《平民》1923年第137期。
- [48] 《上海合作联合会章程》，《时事新报·合作副刊》1922年第38期。
- [49] 《上海合作联合会第一次总务会纪事》，《平民》1923年第138期。
- [50] 《上海合作联合会星期学校章程》，《平民》1923年第139期。
- [51] 《通信》，《平民》1921年第43期。
- [52] 《合作消息》，《平民》1920年第30期。
- [53] 《广州工人合助社来函及答函》，《平民》1921年第75期。
- [54] 《侯厚培晚年自传》，刘建本、许康主编《国立商学院院史（1937-1946）》，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 [55] 《湖南大同合作社第一期试办的经过》，《平民》1921年第61期。
- [56] 《通信》，《平民》1921年第58期。
- [57] 《通信》，《平民》1921年第78期。
- [58] 王世颖：《国际上的同情》，《平民》1922年第123期。
- [59] 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1-142页。
- [60] 伍玉璋：《中国合作运动小史》，中国合作学社，1929年，第68页。
- [61] 《编辑室余审》，《平民》1921年第79期。
- [62] 《开场白》，《平民》（妇女合作专号上）1923年第173期。
- [63] 《湖南查封大同合作社》，《时事新报》1921年11月4日，第6版。

- [64] 陈友荀：《改造中国的惟一路径——农村运动》，《平民》1922年第114期。
- [65] 刘启邠：《合作问题的讨论》，《平民》1922年第115期。
- [66] 同[60]，第29页。
- [67] 《一所新颖的革命大学》，上海市委当时征集委员会主编，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 [68] 叶炳南：《二十年代上海地区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秋人》，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组编印《上海青运史资料》第5辑，共青团上海市委青运史研究组，1982年，第31-33页；刘中天：《回忆刘伯伦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铜鼓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铜鼓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49-50页。
- [69] 许德良：《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党史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 [70] 《团上海地方团员调查表》，中央档案馆等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 1925年-1927年》，上海市档案局印刷厂，1986年，第26页。
- [71] 《团江浙皖地区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4年9月18日）》，江苏省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2辑，江苏省档案局，1981年，第70页；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1922春-1987.10》，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 [72] 李良明、钟德涛主编《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 [7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 [74] 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1921.7-192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00-301页；任务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 [75] 《〈平民〉新生命的创造》，《平民周报》1924年第1期。
- [76] 《今后的〈平民〉》，《平民周报》1924年第1期。
- [77] 汤苍园：《中国之合作运动》，《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期。
- [78] Warbassa 著，倪松年译：《合作运动》，《平民周报》1924年第5期。
- [79] 张廷灏：《合作主义者为什么应该加入政党》，《平民周报》1924年第4期。
- [80] 独秀：《告合作社同志们》，《向导》1924年第56期。
- [81] 为人：《国民革命与劳动运动》，《平民周报》1924年第5期。
- [82] 中夏：《论农民运动》，《平民周报》1924年第3期。
- [83] 同[59]，第144页。
- [84] 同[60]，第28页。
- [85] 同[60]，第29页。
- [86] 《合作运动协会发起人会议》，《申报》1924年7月27日，第14版。
- [87] 《上海夏令讲学会简章》，《民国日报》1924年7月1-2日；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编，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25-126页。
- [88] 同[60]，第22页。

（责任编辑 崔名芳）